

巴洛克的吊诡可能—福柯的〈外边思维〉

博尔赫斯在某一本诗集的序言中说：「作家的命运是很奇特的。开头往往是巴洛克式，爱虚荣的巴洛克式，多年后，如果吉星高照，他有可能达到的不是简练（简练算不了什么），而是谦逊隐蔽的复杂性。」我们不太确定福柯是否曾读过这段话，不过在他才华洋溢的巨著—《词与物》（1966）中，却极巧合地以对博尔赫斯作品的桀桀怪笑开启了他自己的巴洛克式风格。当然，这个「爱虚荣的巴洛克式」福柯并不始于《词与物》，粗略地说，从六〇年代的「文学时期」到七〇年代的「监狱时期」，福柯似乎都投身在一种躁热炽烈的巴洛克式夸大狂（*mégalo manie*）状态里；然后，毫无迹象的，是《性史》卷二呈显的枯山水。我们不仅惊骇于福柯狂躁时的狂躁，更震慑于他转变褶皱后的隐蔽复杂；从一径张牙舞爪到最终「谦逊隐蔽的复杂性」，有几篇文章或著作的章节对于理解福柯思想似乎是极关键的。其中之一，正是发表于1966年的〈外边思维〉（*« La pensée du dehors »*）。

无疑的，这是福柯「文学时期」的代表作。由对布朗修（M. Blanchot）的评论作为起手式，福柯以绵密论述再度牵引出他在这时期所深深着迷且一再援引的沙德（D. A. F. Sade）、克罗索斯基（P. Klossowski）、胡塞（R. Rousset）、巴塔伊（G. Bataille）、马拉美（E. Mallarmé）、阿铎（A. Artaud）…。诚如译者洪维信在「译者导言」中明白指出的，透过这些作家福柯曾对文学展露强烈兴趣与深刻思索；然而，福柯是否就如大部份论者所言，一迈过六〇年代就戛然停止其文学关注，转向「历史学研究」？文学时期是否仅是福柯早期思想中一块无法弥合的碎片、一件值得懊恼的错误？这时期所提出的概念，诸如域外（洪译「外边」）、越界（洪译「越渡」）等，是否如某些论者所言，已彻底被晚期福柯所扬弃与疏远？或许我们已经太熟悉一个制式与庸俗化的福柯或福柯研究，〈外边思维〉中译文的出版无疑挑起我们重新阅读福柯原典的动机：或许「文学时期」（六〇年代）的福柯与「性史时期」（八〇年代）的福柯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或许这两者只是同一块思想平面的拓扑学褶皱或翻转？简言之，〈外边思维〉在今日的中译出版绝对不仅是让我们厘清福柯文学时期的思潮脉络，或许将更逼使我们去

质问一个更基本的问题：究竟什么是福柯文学时期的哲学意义？存不存在一种关于福柯思想平面的强度连续性（continuums d'intensité）研究？

译者洪维信不仅细心译与批注这篇经典论文，也提出极深入专业的导言；特别是导言最后，关于法文词汇中译的个人理解及坚持，似乎也标志了近年来法国当代哲学原典中译的独特现象：翻译行动本身即哲学思考与研究的一部份。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沈志中极具个人风格的译出《精神分析词汇》（行人），林志明不厌其详地重译《古典时代疯狂史》（时报）与《布赫迪厄论电视》（麦田），苏哲安别具运动意涵的译出《解构共同体》（桂冠），龚卓军盈溢诗意与文学隐喻的《空间诗学》（张老师）…。翻译从此转化成一道个人手势，同时成为特异与激进的哲学实践。尽管偶尔我们并不太能被译者（同时也是研究者与思索者）的解释所说服；譬如本书中，洪维信将福柯、德希达、德勒兹、李欧塔等法国哲学家都曾独特构思的 *dehors* 译为「外边」，舍台湾较通用的「域外」不用，选择一个强烈指涉内/外空间性的词汇，尽管译者藉此坚持其法语的生活意涵，但恐怕却因此牺牲其原本反欧几里德空间性的哲学企图；再者，如果「外边」取其日常性，*transgression* 译为「越渡」则似乎又远远「僭越」了这个日常性的坚持…。

在近期出版的译书中，洪维信的《外边思维》、苏哲安的《解构共同体》与龚卓军的《空间诗学》无疑已向本地的法国哲学研究射出一枝待人拾起的响箭，其所标志的不仅是福柯、依曦或巴舍拉研究的出发或再出发，同时也是藉由法国当代思想中译所掀起的激进哲学思索。而随着近来法国哲学研究者的递增，彼此间透过论文或翻译所进行的直接与间接对话势将愈形壮硕繁复，我们相当期待，也乐观其成。